

责编 林莉君

我们愿做高校科研的代言人,教育成就的展示台,社会化服务的信息谷。

E-mail:linlj@stdaily.com

■教育时评

文·王焱烽

近日,女权组织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发布报告称,虽然教育部已出新规,但高校性别限制现象仍广泛存在。据统计,全国112所211工程学校,接近七成在今年高校招生中存在性别歧视,其中34所学校直接违反现有规定,设置男女生录取比例。而在985工程高校中也有31所存在性别限制。该组织呼吁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应承担纠正招生歧视的责任,重新探讨既有的招生性别政策。(8月18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高考“阴盛阳衰”、女生包揽文理状元早已不是什么新闻。以福建省为例,从2002年至2012年的11年间,该省25名高考状元中,女生19人,男生仅6人。不论是文科还是理科,女生都占据明显优势。这导致

别给高校招生存在的“性别歧视”找借口

的结果是,在许多名校,女生人数往往远多于男生。正因如此,相比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,高校招生中存在的男女不公常常被人们所忽视,一些人甚至还打着“性别平衡”“保障就业”等旗号。殊不知,这些借口都存在着明显的倒果为因的逻辑谬误。

其实,高考之所以会出现“阴盛阳衰”的现象,根源在于现行的高考模式更有利于女生的发挥。一方面,相比男生,大部分女孩在语言方面更具天赋,而考试中起码有2个语言学科,这恰恰是她们的强项;另一方面,近些年,数学和理科的难度普遍不大,大部分男生的优势很难凸显。另外,相比于女生的细心、认真和坐得住,男生普遍还存在着粗心等

缺点,容易在基础题目上失分,这就进一步拉开了男女间的考分差距。

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与其在高校招生线上搞“双重标准”,男女区别对待,不如改革现行的教育及考试方式。毕竟,男女学生虽说有差异,却不存在优劣之分。相比于女生的勤奋、耐心、善于记忆,男孩的优势在于个人创造力和探索性,视野也相对更宽。如果后者也能在高考中得以体现,男生何须“特殊照顾”?不去反思应试体制的弊端而要因循“男女分招”来达到所谓“性别平衡”,无疑是南辕北辙,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。

至于所谓“就业问题”。应该说,随着大学生就业

压力的逐年递增,专业对口难度日高,教育与特定专业之间已不存在必然的就业挂钩。更何况,诚如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所言“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”。如果只是为了顺应就业市场,而把本已令人诟病的就业歧视延伸到教育领域,这实际上是在以就业困难为由来限制学生的教育机会。

所以说,别给名校高招“性别歧视”找借口。因为接受教育是每个人的天然权利,教育公平是社会正义的重要前提。无论是文科专业设置男女录取比例,还是理工类学校那样“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录取女生”,都不是正确合理的招生方式,都不利于教育公平地真正实现。

■简讯

教育统计显示:中国学生入学机会继续扩大

新华社讯(邝西曦 吴晶)近日,教育部网站公布的《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》显示,2012年,国家大力推进教育公平,入学机会继续扩大。学前教育阶段毛入园率、初中阶段毛入学率、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均高于上年,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.85%。

公报显示,我国学前教育规模较大幅度增长,全国共有幼儿园18.13万所,比上年增加1.45万所,在园幼儿3685.76万人,比上年增加261.32万人;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8.2万所,在校生14458.96万人,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1.8%,其中初中学校5.32万所,初中毕业生升学率88.4%,与上年基本持平;共有高中阶段教育(包括普通高中、成人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)学校26868所,毛入学率85.0%,比上年提高1.0个百分点。

公报显示,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790所,培养研究生单位811个。本专科共招生688.83万人,比上年增加7.33万人,增长1.08%;研究生招生58.97万人,比上年增加2.95万人,增长5.27%。

浙江:教育成公共财政的第一大支出 新增经费“三倾斜”

新华社讯(记者余靖)近日,浙江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,2012年浙江省财政教育支出逾877亿元,约占公共财政支出的21%,教育成公共财政的第一大支出。

据介绍,2011至2012年国务院对各省财政教育投入实行“分省核定任务,分年考核评价”的办法。其中核定浙江省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目标比例是“2012年达到21%”,比例为全国最高。

浙江省财政厅副厅长、新闻发言人王广兵说,按教育经费法定增长要求,浙江将确保财政教育支出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,推动财政教育投入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增长。“同时浙江将不断提升财政教育投入质量,保证新增经费向教育薄弱环节倾斜,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倾斜,向困难家庭学生倾斜。”王广兵说。

据介绍,浙江的财政教育投入已连续多年持续高速增长。“十一五”以来,浙江省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从2006年的260.04亿元增长至2012年的877.86亿元,年均增长21.79%,高于同期公共财政支出年均18.92%的增幅。2013年安排全省公共财政教育支出预算超过938亿元,比上年增长8.5%。

根据通报,经费的投入推动了浙江各层面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。如2012年,浙江省的小学、初中生均公用经费已达1333元和1981元,高于国家规定的550元、750元的标准。

在新增经费的使用上,浙江优先考虑薄弱环节和弱势群体。如在学前教育方面,浙江省财政设立每年1亿元的学前教育专项资金,专项用于欠发达地区乡镇中心幼儿园建设,支持民办幼儿园发展、困难家庭子女入园资助和学前教育教师培训,2011年至2013年,每所欠发达地区乡镇中心幼儿园能拿到60万至100万元的奖励性补助;又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,2011年至2012年浙江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近10亿元,用于流入地学校改善办学条件,缓解市县财政压力。2012年秋季学期起,全省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生免除学费。

与“大牛”面对面 与顶尖学生零距离交流 进入“大研计划”

中科大夏季小学期让创新的种子早日发芽

■将新闻进行到底

文·杨保国

白天参加“未来物理学家国际夏令营”活动,晚上要做大学生研究计划。大三学生杨宏峰的暑期日程排得满满的。

不出校门,就与“大牛”面对面

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利用学术假来校开设学科前沿课程和讲座,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,拓展他们的国际视野,是中国科大实行夏季学期的初衷之一,所开设的“大师系列课程”成为小学期的亮点之一。

生命科学大二学生钟阳皓选了“生命科学大讲学——结构生物学专题”,虽然他的结构生物学课程大三才开,但由于这个专题邀请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、英国国家医学研究院 Steve Gambin 博士,法国科学院院士、法国巴斯德研究所 Felix A. Rey 博士等6位欧美著名学者主讲,小钟还是动了心。

“虽然不能全部听懂,但开阔了眼界,了解了结构生物学的主要技术,英语听力也明显提高,对以后听英语学术报告大有帮助。”钟阳皓说,那段时间正好有一门考试,一些同学没有选这门课,但考试后还是有不少同学去了,还有一些研究生去听。本来,钟阳皓还选了《Matlab 编程及其应用》《英语写作训练》,可惜由于选的人太多,抽签未抽上。

中国科大教务处副处长李蓓介绍说,经过三年

暑期像杨宏峰一样忙碌的同学,在中国科技大学还有很多。从2010年开始,该校实行了三学期制,增设的夏季小学期内容越来越丰富多彩,成为同学们的“新宠”。

的探索实践,目前中国科大三学期制的目标定位更加清晰,实施也更加规范。春、秋学期主要开设骨干课程,到6月下旬结束;夏季学期4—6周,主要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和国际化教育需求,以及集中实践环节。

同时,根据各年级的学习特点,教学内容安排更有针对性。例如,一、二年级学生以选修课程为主,包括理科基础课、技术基础课、科学前沿课程以及素质拓展课等;大二学生除了选课外,还安排有课程实习、英语训练等;大三学生侧重大学生研究计划和国际交流。

夏季学期课程大多是选修课,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决定是否选,会不会出现大面积“逃课”?李蓓说,学生的认识也有个过程,通过引导,让学生了解为什么增设小学期,有哪些内容,什么适合自己,在统筹考虑后合理选择。“只要学生了解到有好事,就会去选的。”

自2010年“试水”以来,该校夏季学期开设课程、选课人数大幅上升,从当初41门课程、1781人次,到今年的96门课程、近4000人次。

未来物理学家夏令营,与顶尖学生零距离交流

中国科技大学首届“未来物理学家国际夏令营”上,16名来自牛津大学、斯坦福大学等7所世界名校的物理专业大学生,与来自中国科大、复旦大学等中国一流大学的16名大学生一起学习交流了两周。

该夏令营分两阶段进行。第一周的每天上午,由中国科大物理学院“大牛”教授用英文作学术报告,介绍相关领域的学术前沿进展;下午安排有汉语、书法、陶瓷、茶艺等课程,让大家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。第二周,学生选择到感兴趣的教授实验室做一个星期的科研。最后,营员们对科研实践活动成果进行展示。

物理学院杨宏峰是该夏令营的营员之一,他学的是凝聚态物理,听了陈仙辉教授的报告后,就进了陈老师的实验室。根据杨宏峰的兴趣和以后的打算,陈老师安排他跟一名博士生,边学

习边做实验。“两周的时间虽然很短,但收获很大。”杨宏峰说,对相关领域的前沿有了进一步了解,扩大了眼界。同时,与国外一流大学的学生交流,建立了友谊,英语口语也得到明显提高。

“我们举办这个夏令营,目的为有志成为未来物理学家的各国学生,搭建一个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,这是我校推进学生国际化培养的一项新举措,类似的夏令营以后每年都要举办。”物理学院副院长王冠中说。

在“请进来”的同时,中国科大还选送了一批优秀学生到国(境)外学习交流。“严济慈物理科技英才班”尤其令人艳羡,老师联系世界一流名校教授,报名的学生通过网络视频面试,远程录取。该班2010级共43人,其中33人到哈佛大学、耶鲁大学、牛津大学等世界名校做了2个月的暑期研究。



大研计划,让创新的种子早日发芽

中国科大物质学院大三学生李旭,这个暑期都要在国家微米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度过。每天上午9点到位,晚上11点离开,除了午饭、晚饭,一天有10个小时呆在实验室里。

其实,李旭上学期就到曾杰教授的实验室,跟师兄王梁炳做了几个月的实验,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。6月初,他向曾老师提出,要与另外一名本科生一起,独立做一项关于“贵金属纳米粒子的可控合成及其催化性能研究”的课题,得到了首肯。

李旭介绍说,这项研究是将金属化合物原材放入到溶液中,尝试在不同条件下还原成金属纳米颗粒。实验要通过合理设计,目的是通过形貌调控合成出形貌规则的纳米颗粒,如正八面体、二十面体等,这对提升金属的催化性能有很大作用,可用于精细化工、制药等领域。

阅读文献,与师兄讨论实验方案,实验结果出来后再讨论,循环往复。同时,一周跟曾老师讨论一次,有问题随时敲他办公室。“每天操作仪器,很辛苦,而且经常失败,但苦中有乐。”李旭说,当找到一个形貌

好的晶体时,就十分兴奋,有一次无意中找到了20面体,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。

通过这个项目,李旭感到对“贵金属纳米材料控制和催化反应”研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,也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,并建立了信心。他希望以后保研进曾老师的实验室,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。

据中国科大教务处副处长汤家骏介绍,李旭所做的工作叫“大学生研究计划”,参加者主要是大三学生。学生利用一个完整的“传统暑假”,或一年的课余时间,在校内或到中科院研究所,在一线科研人员的指导下,完整地做一项科研课题。大研计划已实施了十多年,近年来仅夏季学期做大研计划的每年有600多项,全年约有1000项,每届本科生有2/3左右参加,“这对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,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”

该校化学院本科生发表学术论文情况,印证了汤家骏的介绍:该院本科生仅去年就发表SCI论文122篇,许多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,其中大部分是大研计划的结晶。

■第二看台

“游学热”调查:“三不管地带”亟待监管

一个多月前发生的韩亚航空空难事件,使“海外游学热”及其伴生的种种乱象凸显在国人面前,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。

游学热到底有多热多乱?游学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应该占据怎样的位置?游学应该怎样监管?记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查。

“修学旅游兴起就是最近十来年的事情”

10年前海外游学刚兴起时,参加者寥寥。新东方国际游学推广管理中心主任刘婷介绍,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留学市场繁荣,近5年游学开始快速发展,尤其这两年更为迅猛。“今年就有1万人报名。”她说,8年新东方游学“做了3万人”,主要以14—17岁的初高中学生为主。

在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看来,游学应该叫修学旅游。

“修学旅游的兴起就是最近十来年的事情。”他认为,3个因素导致游学热出现,一是1998年出境旅游放开,去年出国旅游人数达到8000多万人,其中因私出境占90%;二是家庭对教育投资的重视;三是假期孩子没人照顾,特别是城市里面。

游学是一种市场需求和教育投资。中

“这是一个三不管的灰色地带”

“空难是小概率事件,但游学市场确实需要整顿。”刘婷说。

记者调查发现,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将游学或修学写入法律,纳入政府或行业协会的监管不同,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,游学在我国尚未纳入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行业领域的监管范围。

2012年4月,教育部、外交部、公安部、国家旅游局联合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中国

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说,韩亚航空空难事件发生后个别省份叫停了游学项目。

每年出境游学的人数到底是多少?刘婷粗略估算,近几年中国每年约有20万到30万人参加海外游学,其中约80%由教育局或学校组织,约20%是散客市场,由留学中介、培训学校和出境旅行社机构等主办。

记者致电教育、公安等部门,均表示不掌握这一数据。但公安部出入境管理部门专门统计了最近3年14到18周岁青少年办理护照的人数:2011年为30多万,2012年是40多万,今年上半年达到25万,证实准备出国的青少年越来越多。

“这是一个三不管的灰色地带。”胡本末说,由于政府的缺位,游学市场没有明确从业机构的准入标准和产品细节。而一些中小学通过游学“搭送”老师之类的“潜规则”约定,与旅行社、留学中介机构形成了灰色

利益链。一些学校配的游学老师并不具有专业素质的,而是作为一种奖励安排,一旦在国外遇到各种突发事件又该如何应对?

二是准入门槛不高,游学质量无法保障。胡本末表示,企业办理留学业务需要教育部认定的留学中介资质,开办游学业务则只要具备出入境资格就可以,并没有相关机构检验游学产品是否合格。

孙宏艳说,一些机构、单位资质根本不够,游学难免就成了“到此一游”。“同事给孩子报的就是游学团,学的内容很少,游也是走马观花。”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皮小林说,游学正成为新的消费业态,对游学都应有所界定。

三是缺少标准和规范,存在安全隐患。“游学是个良心活儿,必须做到实处。”刘婷说,由于缺少行业标准和规范,从很多机构发布的游学产品中,很难看到细节如何做,因此,风险不小。

四是游学向大城市扎堆,向海外扎堆。游学一般应是由近及远,先国内后国外。正在就游学现象进行调研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高峡指出,不像一些国家已经成为普遍性的公共教育产品,游学

在国内刚刚起步,只有部分学生能体验。因此,加强管理和引导,才能让游学活动健康有序。

“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和保护体现一个国家的文明素质”

最近的一件事,让戴斌颇有感受:女儿不久前随妈妈去欧洲旅游,由于工作原因他去了,欧洲有关部门便要求他签订协议,将监护权全权交给妻子。

“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和保护体现一个国家的文明素质。”戴斌说,发达国家都是从规范游学活动,通过标准、规范甚至法律进行规范。“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,加上识别能力有限,思想行为易受外界影响,如果对游学活动不加以规范,对孩子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可能都会产生负面影响。”

皮小林深表赞同:“参与游学的消费者多是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,更需进行法律保护和应急救护,游学团要比普通旅游团的要求更高、更规范。”

记者了解到,在一些国家和地区,作为青少年教育的重要环节,游学被纳入了规范化轨道:有的有相应部门或者协会负责行业

管理,有的出台相应守则和指引加以引导,对从业企业进行核查和公示,并制定统一的规范化合同文本加以规范。

多位受访专家指出,游学或者修学集教育、旅游于一体,兼具市场属性和教育属性,是提高青少年素质的重要途径,应当从战略高度审视其重要性。教育、旅游等部门应根据中国国情,借鉴美、欧、日及港台地区的有益经验,尽快出台法规,制定科学的准入门槛、资质规范、合同文本以及惩戒等制度,将游学活动纳入国民教育体系,纳入规范化、法制化轨道。

游学应像留学一样成为单独行业,由教育、旅游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颁发资质。胡本末说,国家还要进行管理规范、产品设计和控制,对公立中小学要有约束。

刘婷表示,应尽快明确游学的监管主体,落实安全问责机制,可以具体到如交通工具的选择、多家险种的参与等,以最大限度保障孩子安全。

据悉,游学活动已引起教育部门高度重视。从去年起,教育部已在上海、江苏、安徽、陕西4省市开展“研学旅行”试点。目前,教育部有关司局正进一步就游学问题开展调研。

(据新华社)